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来看,对于任何活态的文化艺术,要想保存其原生态的纯粹性,就不得不关注其自身生态的生存发展状态,不得不认真审视它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运行法则。因此,研究大生态与小生态互动发展的规律,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忽略了这种大、小文化生态圈的交融演变,就必然会导致许多珍贵的艺术遗产流失。从半个多世纪的剧种改革看,上党梆子确实对其多声腔小生态存在较为严重的忽略。除了上党二簧的部分传统剧目如《打金枝》、新编传统戏《皇帝与门官》还在上党流行外,上党梆子的传承、创编主要集中在梆子腔,而昆、罗、卷三个声腔已经消失。上党梆子的一枝独秀实际标志着多声腔小生态的失衡和断裂,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

当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深入,对于文化生态保护的观念也不断取得推进,文化生态对于传统戏剧的作用和意义基本上还是能够被人接受。但是,忽视了戏

剧的小生态建设,大的文化生态就会显得空洞而无意义,保护好大生态和小生态是保存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环节,这显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从中国传统戏剧的遗存来看,中国各地戏曲艺术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附着多声腔的特征,这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并没有很明确的剧种观念,以及旧日戏曲班社组班原则对于多声腔的作用。因此,保护好一个传统剧种,实际上就要在鉴别好这个剧种所包含的多元遗产的前提下,尽量地把历史上对剧种有所作用的诸多艺术元素进行保护,维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

显然,从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和这一剧种独特的大、小生态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关注大生态与小生态的流变规律,对于保护中国各地古老的戏曲文化艺术遗产,对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戏曲艺术的保护、传承需要继续深入。

试析赵树理小说写作策略的内在矛盾

乔林晓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8)06-0121-03

一

赵树理曾经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学家就是我的意愿。”^①“文摊”的写作立场决定了赵树理与众不同的文学追求与审美取向。对趣味的特殊喜好便是这一写作立场的衍生物,可以说,趣味意识是赵树理写作生涯中尤其注重的东西。同时,在赵树理在写作活动中还尤其强调“问题”意识,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宗旨时认为:“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在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那时我们有些地方的工作不够深入,特别对于狡猾的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

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②

趣味意识是与消遣、娱乐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问题意识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概念,二者甚至是一对矛盾体。从赵树理创作的整体上把握,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在他的写作生涯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从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成名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创作终止,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其实是作为一对矛盾而体现出来的,40年代作为赵树理写作的鼎盛期,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曾经很好地统一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到了50年代,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对文学的规范与要求越来越严格,赵树理的写作也越来越受到外界的诟病,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在他的小说中开始呈现出分裂的征候;6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空气的日益紧张,文艺界对赵树理作品批判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这对矛盾体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已经趋于瓦解。

收稿日期:2008-06-07

二

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中天然地就有一种“问题”意识,在艺术上表达这种“问题意识”时会有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趣味”意识。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真正地了解农民,知道他们平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对农村民间社会的各种民俗、民风同样了然于心。参加工作后,又长期在农村基层参与社会变革,早年便萌生的让广大贫苦百姓翻身过上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在从事具体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变得更加迫切了。

赵树理的这种写作立场也决定了他以“问题”意识的目光进行创作,在艺术地处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素材”时,必然要带着自己独到的艺术标准去把握与处理这些“素材”,这种艺术标准便是“趣味”意识。《小二黑结婚》正是由于找到了“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的最佳契合点,从而使作品创作出来后,成为一部艺术佳作。董均伦在《赵树理如何处理〈小二黑结婚〉材料》一文中,具体地谈到了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1941 年上半年,新政权在太行山建立已经有 4 年了,土改开始仅仅 1 年,当时农村有个几乎与土改同等重要的问题便是反对封建思想、封建习惯,“因为那时不但地主维护封建,就是一般农民也是如此。《小二黑结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的。”^[9]赵树理当时在太行山根据地听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位名叫岳冬至的男青年和一位名叫智英祥的女青年因为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而自由恋爱。智英祥同时又被出身富农的村长和青救会秘书看中,在这两位村干部遭到了智英祥的拒绝后,便联合其他村干部以腐化等各种罪名来斗争岳冬至,最后把岳冬至给活活打死了。作品中赵树理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了巧妙而得当的艺术处理,最主要的艺术创造在结尾,正是在这里把“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统一起来。“原故事的结局赵树理认为太悲惨了,既然写反封建的东西,应该给正面人物找出出路,照原来那个结局正面人物给封建习惯吃了的,写出来不能指导青年人和封建习惯作斗争的方向。可是当时是革命初期,群众性的胜利,例子还不多,光明的萌芽还是自上而下支持着(当时的村长都是自上而下委派的,所派的人还不一定是本村人),除了到上级去解决,赵树理没有想到其他办法,所以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弄了个大团圆。”^[10]这一合理性的改写既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迎刃而解,也迎合了下层民间草根社会欣赏趣味与习惯,暗合了他们多年来积淀在内心的这种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心理诉求。在民间社会,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层民众总处于一种受欺凌的弱势地位,一旦受到不平 and 苦难时,总想寄托或寻求一种虚幻或者神秘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而这种虚幻或者神秘的力量大多数时候会是宗教力量或权力结构,由它们代表着正义去除恶务尽,老百姓喜欢欣赏的那数不清的“清官戏”以及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借助神仙教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神秘传说,同样也是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化作想象世界中的“趣味”,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由村长、区长借助着权力的介入,使两个青年人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作品发表后,不仅受到老百姓的喜欢,也得到了当时主

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

到了 50 年代,有人发现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的确有些迟缓了、拘谨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11]。如果换一种角度考察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正是由于 40 年代曾经高度契合的“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已经出现了分裂的征候。按照赵树理早年形成的“文摊”写作立场,由“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二者统摄起来而形成的特定的审美取向、故事构建等,只适合创作类似古代传奇话本或拟话本式的中篇或者短篇的主题作品。如果以既定的写作立场去把握宏大的史诗性作品,难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状况。另一方面,“如果以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较大的空间,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惯与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 50 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农村社会变革进程大多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体认基础之上的艺术想象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12]换句话说,当年那“青春泼辣”的“趣味”意识,那容纳他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趣味已经受到各种写作规范的抑制。而曾几何时一度为作家所看重的“问题”意识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严厉的压制。其实,还在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之后,赵树理的写作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1948 年写出的《邪不压正》中便表现出不合时宜的苗头。在作品中,赵树理仍然重视“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的统一,把写作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与流氓身上,揭示农村土地改革的复杂性。批判那些地痞流氓和具有流氓习气的村干部,同样又把结局引向光明的前景,邪气一定不会压倒正气。但小说发表之后,却引来了较大的争议,有的论者批评赵树理的写作“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没有结合整个历史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过程”^[13]。到了 1949 年之后,随着对写作规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赵树理随之对他的写作立场做了一些调整,不再刻意追求“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的统一,“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说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教诲的功能观。”^[14]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然农村开展的“运动”仍然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15]

三

进入 50 年代,赵树理对激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赵树理自己回忆道:“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到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的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部,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入京之后,事情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给耽误了,如不下去体验新

的群众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然写不出好东西来的。”^[1]胡乔木等人虽然怀着强烈不满的心情给赵树理开过书目,企图改造和提高赵树理,却未见成效。随着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展开,要求文学紧密配合政治的呼声愈发高涨,要求文学塑造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新人物、典型人物。写于1955年的《三里湾》便是赵树理试图突破自己以往创作模式的一次尝试,作者努力超越过去那种“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相统一的写法,追求一种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但历史证明,这部作品的写作并不是很成功的,反而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有的论者曾经认真分析过《三里湾》文本的内在复杂性,认为“《三里湾》不是单一层面的叙事文本,而是一个充满紧张关系的复杂文本,一个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定制的显性文本,另一个则是作家赵树理心理和经验层面发生,经由文本的多重意象发生的隐性文本”^[2],在显性文本的层面上,作家要叙述的是“千百万农民努力挣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在党的带领下,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3]的关于合作化的宏大叙事,但在隐性文本这一层面上,作家的人格使他不可避免地,把亲身感受到的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无奈、紧张与痛苦表现出来,流露出对权力话语粗暴干涉农民自主选择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深困惑,这种分裂使小说在具有思想张力的同时,也具有了不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杂音。因此,尽管它是建国之后叙述合作化最早的小说,却并没有给作者带来太多的声誉。也许在创作中赵树理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极力发挥自身的长处,多写民俗、民风这些充满“趣味”性的东西。

在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小二黑结婚》关注的问题是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李有才板话》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地方政权,《地板》注意更多的则是土地出租问题。而解放区民主政权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与赵树理创作理念中的问题保持着相对一致性。到了50年代,赵树理发现自己在实际生活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新政权所要着力解决的。党的文艺政策已经不允许赵树理继续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这些“问题”。在《三里湾》中,作者是以宏大叙事的策略把“问题”压制在隐性文本之中,从表面上看,“问题”意识已经消解在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当中,实际上赵树理在创作中的矛盾形态一直存在,这也是造成作品文本内在分裂的根本原因。在农村搞合作化工作时,赵树理遇到一个可以称得上革命家庭的社员郭海莲,农业社开渠要经过她家的地,动员它入社,她不入,拿社里的地和她换,她不换,赵树理做了许多动员说服工作,一无所获。最后郭海莲寻死觅活地大闹,赵树理也没办法^[4]。在给长治地委负责人的信中,赵树理先列举从别处得到的农业社发生的问题,如供应粮食不足,缺草、缺钱、命令太死板、地荒了、麦霉了等问题之后,不无苦闷地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草、缺钱、却粮,地荒了、麦霉了,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同时,他还指出许多乡社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是没有把群众当人对待的,”^[5]这些材料说明,赵树理确实

对中国农民的处境和意识有一种深刻的体认,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的“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相统一的写作策略已经出现分裂的征候。可见,5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心态明显不同于40年代,这时候的写作更加偏重“趣味”意识,作品中常会出现大段大段的风俗描写,这也正是有人发现赵树理创作“缓慢、拘谨”的原因所在。

进入60年代,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近似人物速写的作品,意在发掘老一辈身上的优秀品质,歌颂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这些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另一种如《卖烟叶》、《互作鉴定》、《张来兴》等,这3篇在叙事策略上有极其复杂的特征,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是对个人写作生涯的反思,”“三篇小说探讨的是写作自身,《张来兴》涉及到复杂的叙事技巧,而《卖烟叶》、《互作鉴定》则直接以写作为文本为中心。这是赵树理小说写作生涯一个有趣的转折,以往赵树理的小说往往以全面性的农村政治/文化问题作为中心主题,而这三篇小说则转向了农村生活的边缘。”^[6]“《张来兴》中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厨师,《卖烟叶》、《互作鉴定》的中心人物则是知识青年,这些人物符码似乎都属于农村文化中难以定位的层次,与赵树理惯于表现的正统农民相比有较大的差异。”^[7]可以看出,赵树理创作的晚期已经完全远离了40年代那种“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相统一的写作策略,也与50年代创作中把“问题”意识隐藏于文本背景位置,着力表现“趣味”意识的写作策略有所不同,这一转变同样和当时严酷的外部写作环境有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 马艳]

参考文献:

- [1]李普.赵树理印象记[J].长江文艺,1949(6).
- [2]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J].火花,1959(1).
- [3]董均伦.赵树理如何处理《小二黑结婚》材料[N].文艺报,1949(10).
- [4]孙犁.谈赵树理[N].天津日报,1979-01-04.
-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评《邪不压正》与《传家宝》[N].人民日报,1950-01-15.
- [7]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A].赵树理全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 [8]赵卫东.三里湾隐性文本的意义阐释[J].学术月刊,2005(1).
- [9]高捷.赵树理传[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2.
- [10]赵树理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 [11]张颐武.赵树理与写作:解读赵树理最后三篇小说[A].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赵树理研究文集(上)[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